

福建党史资料

第 三 辑

(609)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福 建 党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1. 罗明同志谈福建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 (1)
2. 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邓子恢、张鼎丞(17)
3.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45)
4. 叶飞同志关于闽东党的斗争历史的回忆
..... (85)
5. 回忆闽东党的斗争历史..... 范式人(98)
6. 回忆闽东红军斗争历史..... 陈 挺(135)
7.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粟 裕(172)
8. 红军攻打漳州..... 聂荣臻(213)
9. 回顾红三团在闽南的战斗历程..... 卢胜(224)
10. 曾镜冰同志对闽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245)

罗明同志谈福建建党和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

我们福建闽西南的党主要是在大革命初期受广东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党在广东建立了两广区委，名叫广东区委。广东区委管广东广西两个省和福建西南部以及香港南洋的工作，书记是陈延年同志，常委有周恩来同志等。在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革命的策源地。

我于一九二一年秋，从广东大埔到福建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一九二四年夏天，学校闹风潮，罢课抗议校长叶渊压制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厦门压迫和凌辱中国人民的罪行和军阀开枪打死集美学生李文华的斗争。我参加罢课后，因学校宣布提前放暑假，停止开膳关闭宿舍，我和全校同学一起被迫先行离校，回到汕头，碰见兰裕业同志（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兼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成员）。他和我谈了几次话，了解了厦门、集美情况后对我说，闹风潮，正说明学生有力量。但没有领导核心以致失败，提出要我回集美做工作。他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后，广东的革命形势很好，一定要我回集美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又回到集美学校，根据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进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建立秘密组织。

当时我们党主张发展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共青团广东区委指示我们在集美学校开展革命活动时，首先要支持国民党左派，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秋，厦门已成立福建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那时，负责人是左派江董琴，因为江董琴在广州活动，只介绍温闽仙（左派）为秘书长，实际上具体工作为一些右派所把持。还有人同杨树庄有关系。广东共青团区委指示我们，不要同厦门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发生关系，我们所发展的国民党员表格直接送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共产党员杨匏安直接处理这项工作，他们对集美的活动也直接发指示。集美学校有师范部、中学、水产、商业、女师和小学等部。师范部苦学生多，他们读书很用功，也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左派发展较快。如永定来的有陈正、曾牧村、胡永东、卢肇西、卢其忠；上杭来的有林心尧、蓝为仁、兰为龙、张楷；龙岩来的有陈国华、谢景德、杨世宁；平和来的有朱积垒、朱思。他们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为闽西南革命斗争作出了一定贡献。当时集美学校有二、三千个学生，社会上各种思潮都影响到学校里来。如女师部有个教师就是国家主义派，又名醒狮派，他在全校推销《醒狮报》，宣传国家主义思想。学校中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水产部有个教师就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集美图书馆各种书刊杂志都有，其中有我们党中央出版的《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这些刊物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广东方面经常给我们写信，也寄来很多宣传材料，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等等散布很广，学生思想倾向革命，在三个月中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福建和广东不同，还是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所以左派组织这时还是秘密的。广东团区委知道了集美情况后很高兴，来信指定

我为共青团的通讯员，并表扬了我和李觉民、罗扬才、邱泮林、刘端生等人所领导的左派活动，鼓励集美左派要加紧活动。我们成立了星火周刊社，出版《星火周刊》，讲革命大事，也讲学生的思想和要求，很受欢迎。一九二五年春，学校开学以后，我们根据共青团广东区委指示，以左派组织为核心，恢复了一九二四年夏天被解散的集美学生会，领导全校学生运动。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集美学校的左派组织领导学生会，发动召开追悼会。学校当局见此情况，也出了一个布告，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我们借这个机会，宣传国共合作，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影响很大。到了五月一日，学生会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大会的声势很大，影响很好，不但全校的师生员工都参加了，校外的筑路工人，打石工人也都来参加。学校当局有顾虑，担心这样下去学校会闹风潮。会后数日，师范部主任找我谈话，说是我发动的。我说：“我个人怎样发动呀！是学生会讨论决定的。”他又说：“是你发动也好，不是你发动的也好，学校发一个文凭给你，要升大学就升大学，要教书就教书，以后补发正式文凭。”我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我们的领导小组讨论，怎么办？大家认为：“你既然已被发现了目标，还是离开好，不然会影响到其他人，以后工作会发生困难。”大家还认为：“毕业考已考过了，可以走。”同时要立即报告共青团广东区委，赶快派人来指导工作，发展党员、团员。因为集美发展的国民党左派的条件是比其他地方高的，第一条就是拥护共产党，第二条才是拥护国共合作，第三条拥护三大政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其他地方发展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也是拥护国共合作，但他们有的人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的。集美的国民党左派，除了拥护国共合作外，因为受《新青年》、《中国青年》的影响大，参加组织的条件比较高，已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准

备了条件。我写信给共青团广东区委后，于五月十日离开集美学校。共青团广东区委接到信后于六月初派兰裕业到集美，建立共青团组织，发展了李觉民、罗扬才、邱泮林、刘端生、罗良厚、还有罗贤开、罗调金（此两人以后表现不好，离开了组织）等七人为共青团员，正式成立厦门第一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李觉民（具体情况见一九二五年兰裕业给恽代英同志信）。这个团支部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学校举行罢课，并组织学生到各工厂、农村做宣传工作，配合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

我自离开集美后，到广州考进了广东大学理科读书，开学后我才正式加入共青团，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当时一面读书，同时还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当干事，工作了半年。罗扬才同志当时是在厦门大学读书，被选为出席全国学生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到广州参加会议。罗扬才是团员，来共青团广东区委报到，那时，我还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谈了罗扬才在集美、厦门情况。中共广东区委很关心，决定在福建发展共产党组织，就通知学生代表大会的党支部吸收罗扬才同志入党，这是福建厦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厦门当小学教师的李觉民同志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也是团员，报到后，广东区委也很关心，通知大会的党支部发展他为共产党员。这是福建厦门的第二个共产党员。以后广东区委又调罗秋天（共产党员兼共青团员）从广东大学转到厦门大学读书，这样，厦门有了三个党员，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间于厦门大学建立了厦门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罗扬才。

一九二五年冬，毛主席在广州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全国各省学员三百多名，为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发展的需要，培养各地农运干部，开展各省的农民运动。所以这次特别重

视在各省反动统治区的招收学员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组织派我回厦门招收学员，分配名额十五名。我带有林伯渠同志（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介绍信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厦门招收学员。广东党团区委都委任我为特派员，交给我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任务。我到厦门后就和党支部商量，一方面讨论怎样招收农讲所学员，另一方面讨论怎样发展和整顿党团组织，当时我们应用了广州的经验，举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培养骨干。从我到达厦门以后，党团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集美学校的刘端生、邱泮林、巫炳熹、谢如香，厦门大学的刘大业等人已入了党。还在中山中学、工人、农民中建立了党组织，共有七个支部。工人支部书记柯子鸿、禾山农民的支部书记严子辉。集美学校及各地党团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这时，以厦大原有党支部领导为骨干，成立了厦门党总支，领导厦门市各支部和漳州支部以及闽西各县的党组织；团也成立了总支，领导各地团支部，上属广东区委领导，上海中央对厦门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指导关系，也有派党团员回厦门向漳州工作。厦门的党团支部一开始就很重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因为厦门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不敢搞上列的各种群众运动。我们用联欢会和俱乐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种工人组织。还有一百多个妇女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厦门有一个道南女中校长王兆惠，她是国民党员，拥护国共合作很赞成建立这个妇女组织。严子辉同志在厦门禾山搞农民运动，柯子鸿在厦门搞工人运动，都很活跃。这时，厦门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接到广州的指示，要正式成立福建省党部，厦门总支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谈了广州左派和右派斗争的经验。所以决定总支部要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右派斗争，进行选举工作。那时集美学校的国民党都是左派，中山中学也发展了左派组织，半年多的时间在厦门建立了二十个国民党区分部。集美左派有的早已回闽

西积极进行活动，单永定一个县就发展了六、七百个国民党员，上杭也发展了一百多人。厦门的国民党右派也建立有二十个区分部。张贞的独立师在诏安发展了六百多个党员，都是属于右派领导。在左右派力量对比上，左派是多数，通过议案，投票选举委员，左派都占优势。选举结果，罗扬才、李觉民、阮山（都是共产党员）三个人当选为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国民党右派也有当选为常委的。其他还有中派，如春生堂老板郭礼宗也当选为常委。这次正式成立的福建国民党省党部，因为有了左派参加，所以，在北伐军进入福建前后，能起领导作用。

漳州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与上海、厦门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九二五年上海许多大学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以后党决定把参加运动的一部分学生分散到各省活动。翁振华同志就是这时候由上海党中央介绍，经过厦门总支部来到漳州的。他是台湾省人，有个亲戚李山和（台籍）在漳州附近的园山开办农场。有他做掩护，对我们搞革命活动很方便。罗扬才原籍广东大埔县，与我同村，他过继其叔父罗杏举在漳州开小店卖香烟、火柴，寒暑假罗扬才经常住在漳州，对漳州很熟悉，我和邱泮林在集美读书路过漳州也在他家里住过。罗扬才、翁振华、谢志坚常在一起，他们三人在漳州活动，发展了党和团的组织。当时在二师参加组织的有王德（曾宗乾）、王占春等同志，成立了支部。后来还有许土森同志的工人支部。

关于招收广州农讲所学员的任务。闽西南名额原应十五人，（闽北名额由上海中央选送），但只招了九人（朱积垒、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温家福、王奎福、胡永东、李联星、黄昭明），这是由于陈伯达干扰破坏造成的。陈伯达从外地回到厦门，知道我来厦门招收学员，有意布置厦门春生堂老板郭礼宗约我于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去喝茶谈话。党总支分析此人系国民党省党部常务

委员，属于中间派分子，可以争取他，认为可以去谈谈。我便如约前往。老板接我进店上了二楼会客室，便见到陈伯达及其所邀的十余人已摆好阵容。我一坐下，陈伯达即发动他们纷纷发言，攻击我是“卢布党”，质问我为何来厦门，为何还不走。我说我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招收农讲所学员，反对他们造谣诬蔑共产党和我个人。他们继续大肆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勾结苏俄，实行专制，叫嚷只有美国和菲律宾政府才是“自由民主”，他们攻击三大政策，胡说工商业资本家受摧残压迫，企图蒙蔽在场的商人。对于他们的攻击，我当时一一加以驳斥，并说明广东国民党政府领导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共同反帝反军阀，广东各地都有商民协会，工商业照常经营。反驳了之后，我离座下楼。从这一场情况看，暴露了陈伯达反共反工农反苏的真面目。我回到厦门大学，党总支同志得悉右派分子企图谋害我的阴谋后，，当晚立即送我到附近工人家里去秘密住了六天后送我上船回广州。四月初我回到广州。广东区党委听了我的汇报后，分配我任宣传部秘书。那时，我才知道陈伯达在厦门对我的围攻与广州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有关联的。

(二)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向湖南挺进，攻克了攸县，六月和第四军二个师向长沙前进，声势浩大。蒋介石才于七月一日宣布北伐。汕头何应钦第一军也准备进军福建。七月初，广东区党委派我到汕头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培养农工运动骨干，准备开展工农斗争，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九月初我接任汕头地委书记，原书记赖玉润调广东区委任秘书长。十一月间何应钦带领的北伐军开往梅县从闽西攻打漳州，经泉州向福州进

军。厦门、漳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了。

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九个福建学员，在学习期间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月，广东区党委把这九位学员派到汕头地委来，经地委讨论决定照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决定，这九位学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身份，分配到闽西、闽南各县工作（因为广东区党委规定厦门、闽南和闽西的工作由汕头地委就近领导）。龙岩郭滴人、陈庆隆（陈子彬）、朱文昭，上杭温家福、王奎福，永定胡永东，平和朱积垒，漳州李联星，诏安黄昭明。他们回到闽西、闽南各县按照章程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同时秘密建立了党支部。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奉命到了厦门，先成立中共厦门市委，市委书记罗秋天，罗扬才任组织部长，吴世华（原厦门大学学生，因闹风潮到上海厦门大学读书，以后又回厦门）任宣传部长，杨世宁（原集美左派，也到上海读书，回来活动）任工委，同时成立了总工会，罗扬才任总工会委员长，杨世宁任副委员长。下面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斗争，举行罢工，增加了工人工资，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工人有了自己工会的领导，很团结，有会员几万人。我到厦门后，由厦门总支通知闽南闽西各县党组织派代表到漳州开扩大会，讨论工作，并成立闽南特委。闽南特委设在漳州，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的工作。漳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都在闽南特委直接领导下得到很大的发展。

闽南特委，由我任书记，宣传部长翁振华，组织部长刘端生，秘书长邱泮林，农委李联星，工委农工（台籍），（后由许士森任工委），妇委谢志坚（翁振华的爱人），特委委员还有厦门的罗扬才、罗秋天，平和的朱积垒，闽西的陈庆隆等二十七个人。（朱积垒当时还从平和带来朱思和黄廷钧二人来参加扩大

会。黄廷钧是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支部的成员，在法国参加了党，是周总理领导的。）闽南特委成立以后，积极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各地的的工作。党在各地的组织都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

北伐军进福建是得到人民拥护的。由于我们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蒋介石为了造成与武汉对立的形势，急于在南京建立一个右派的政府，匆忙调何应钦部队进浙江。张贞率独立师从诏安出发，很快地经漳州到福州，做了东路军指挥。政治部主任是左派江董琴。政治部组织科长陈明（又名陈少微，共产党员），宣传科长陈祖康（共产党员，以后叛变），还有共产党员张余生（他在汕头工作时经常到诏安县与张贞、陈伯达联系。“四·一二”事变以后叛变）。当时汀州监察专员是谢秉琮（共产党员），龙岩监察专员是张旭高（集美学校的左派，以后参加共产党），漳州监察专员是陈卓凡（国民党左派）。北伐军进入福建时，漳州这地方比较重要，江董琴打电报请广东区委派人，区委转电到汕头地委，经过与彭湃同志商量，提出广东揭阳县县长陈卓凡来漳州。为以后好做工作，临出发前，彭湃同志介绍我与陈卓凡见了面。陈卓凡在漳州期间，经常和我们联系，问我们要他做什么工作？需要帮助些什么？他还表示我们如要经费他可以帮忙，我婉言谢绝了，表示我们党的活动自己有经费。泉州的监察专员陈文总就不同了，他跟陈伯达关系很好，陈介绍他当专员。我们派人去联系，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他都不接受，因此泉州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据根毛主席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我在汕头办过东江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是广州带来的，效果很好。在漳州时我们向陈卓凡提出要办工农运动干部养成所，推他当所长。经费和财务支出由他派一个总务直接管理。养成所设在二师（丹霞书院），从各县招

收了共一百多个学员，闽西也选派了一部分学员来，对内我挂了一个秘书长的名义，我的身份对外没有公开。教务主任翁振华。邱泮林和我都兼了课，翁振华讲革命史，李联星讲农民运动，谢志坚讲妇女运动。当时我们向谢秉琮、张旭高也提出要办讲习所，于是谢在上杭就办了汀属八县社会人员养成所，（有的材料说罗明去了，不正确，去的是罗调金。）张旭高在龙岩也办了行政人员讲习所，上列地区都培养了许多干部。

中央很关心福建的党，北伐军进福建后就派王荷波同志为特派员到福州，准备成立福建省委。当时闽南特委属广东领导，福州市委属上海中央领导。上海中央写信叫我于三月十日赶到福州商量。当时福州党的领导人方尔灏、陈昭礼、陈应中同志商谈了几天，王荷波同志考虑到成立省委的条件不成熟，认为还是分别成立闽南特委和闽北特委为好。王荷波同志问我从汕头随北伐军来的工作团有否能担任书记的人选，我提了徐琛同志。王荷波同志很慎重地和徐谈过几次话，经讨论后任他为福州特委书记。余洁贞（徐琛的爱人）也在福州特委做妇女部长。

蒋介石决定“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福建国民党反动派抢先发动。福州是四月三日。徐琛和余洁贞同志从福州回广东的途中在厦门被捕，解回福州。厦门是四月九日，罗扬才、杨世宁两同志被捕，后解往福州，四位同志都为革命英勇就义光荣牺牲了。有人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四月十二日，广东是四月十五日，厦门是四月九日，福州是四月三日。为什么厦门和福州会比全国其他各地早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较弱。何应钦到了浙江、上海后，在福州的张贞独立师只有一个团打过仗，厦门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不多，全省各地的反动力量也是比较弱的，同时福建工农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反动派看到这种情况，就迫不及待先下手。我于三月二十日离开福州回漳州

后，海澄陈剑垣（国民党左派）专程送来一份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翁振华同志懂得日文，他翻译出来。大标题是“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政变”，具体内容很多。特委立即开会讨论。我联想在汕头工作时，广东区委就看出蒋介石是新右派，真正的左派是廖仲凯先生，他早已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当时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志就指示过我们，要注意资产阶级新右派的叛变，要提防他们突然袭击。在汕头还开过党员大会，传达这个通知，进行讨论和做准备工作，所以我印象很深。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不走湖南走江西，开往南昌进浙江，这些行动我们就感觉不对头。在漳州时我们也看到南京和武汉是对立的，于是特委就决定要加紧做好准备，并向各地发了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因当前形势好了就放松警惕，要提防敌人破坏，提防敌人搞反革命政变。组织上还注意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当时厦门组织由于数万工人斗争，声势大，对此事不够重视。四月九日晚上罗扬才、杨世宁等人突然被抓去了，说是约去谈话，到海军司令部后就被关起来。特委很快就接到厦门的报告，开了紧急会议，认为敌人已经开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立即决定漳州工农养成所结束，把学员派回各县工作，并做好机关和基层组织的秘密工作，随后我就赶到厦门。厦门总工会的同志听到罗扬才、杨世宁被抓后异常气愤，工人纠察队手持木棍到海军司令部连续示威了好几天。厦门海军一方面出动了大刀队，高举“格杀勿论”四个大字，另一方面赶紧把罗扬才、杨世宁和黄浦树秘密解到福州。黄的父亲是南洋华侨，有点钱，通过关系保出去了。罗扬才和杨世宁被解到福州后，与徐琛夫妇押在一起，他们在狱中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罗扬才同志在牺牲之前，乘他父亲罗杏举去看望他时带回了一封信送给特委，表示他们要和敌人斗争到底，请同志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临刑前还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福州市群众见到共产党人这种为革命而坚决斗争的牺牲精神很受感动。

厦门“四·九”事变，罗扬才、杨世宁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党的一个大损失，但这时党的市委机关和基层组织没有被破坏。特委决定罗秋天同志因有色彩调走了，派刘端生同志任市委书记。漳州由于事前有所准备，党、团基层组织和党团领导机关没有受到破坏。以后特委开了会议，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加紧秘密工作，在城市继续领导工人、学生，在农村继续领导农民，坚持日常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压迫。由我和罗秋天同志到闽西，在漳州，特委留秘书长邱泮林和几个委员负责领导工作。对各县的领导对外不叫特委，只提联络站，坚持了日常工作，有要事再和我商量。第二，事变后思想动摇的，经教育后要走的就让他们走。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的，继续参加斗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可吸收他们入党。我们及时提出继续注意发展党的工作，适应了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在这历史大变动时刻，有些革命者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很激愤的，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福建的邓子恢同志从日本留学回来，在赣州作工人运动，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因国民党通辑他，他就回到龙岩。刚好那时我在那里，他就向支部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我们很赞成。调查清楚了就恢复。他是留学生，在白色恐怖下不但没有退却，还要求恢复党籍继续革命，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报上级批准后恢复了党籍。在厦门、漳州也有这种情况。第三，决定在做好城市工作的情况下，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特委决定了我和罗秋天到闽西，加强龙岩、永定、上杭、平和等几个县农民运动的领导。这三县有农讲所学员坚持工作。那时，集美的左派也在那里活动。闽西监察专员的班子虽然散了，但各养成所培养的学员还在农村坚持革命斗争。

有人说，为什么闽西能比较别地区先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当然，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三下闽西起了重大作用，但闽西本身工作也有基础的。一九二八年秋起已经组织了各县的游击战争，成立了上杭永定龙岩三县游击区。闽西工作的发展还有几个重要原因，集美学生左派一百多人，三分之二以上是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的人，他们回乡后，任教，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江董琴作北伐军东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派出的监察专员，都很接受我们的意见，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我们要办农讲所，就办了。农讲所的学生和集美的左派学生散出去，都对闽西的工作起了应有的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全国农讲所的学员回到各县执行党的政策，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广州提出的要发展农民运动的政策，比较坚决，是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力量。这样闽西有游击战争的基础，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三下闽西，消灭反动军阀，所以，比较早开辟成为革命根据地。

我和罗秋天到闽西，先到永定下洋，陈正、曾牧村、卢肇西等左派先后加入共产党成立了党支部。我们觉得下洋这个地点很好，就留罗秋天在那里工作，我和曾宪安赶往上杭，二天到达，第二天晚上开党员会议时就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张楷、包究生、周继英三个人，并且挨家挨户搜捕傅柏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傅的名字。原来，傅柏翠是国民党左派。我和曾宪安当时藏在开会地点学生同志的家里，他劝我离开，说他母亲很害怕，于是我们天一亮就走了。在城南河边我们看到反动派在南门城楼上杀包究生周继英等人的场面。我装成一个小学校教员，回到永定。后到了龙岩郭滴人同志处，商量工作。以后又到平和朱积垒同志处。但他的家离县城只有几里路，敌人随时可来搜捕。连什么文件都会被抢光的，不安全。我问还有什么地方？朱积垒同志说还有一个长乐乡。这是罗牡丹同志父亲罗谷香

的故乡，离这里三十里路，山区，又是姓罗的，我说那很好，因为我也姓罗，容易去搞好关系。那里可以做一个据点，于是我们就去了，乡里人同我排辈次，我说我是“韶”字辈，叫罗韶华，他们信了。我说要借这个地方工作，他们表示欢迎。就把农会、县委等搬到那里去了。我和朱积垒同志商定就把这个乡建成据点，向左右各乡发展，造成包围县城的形势，准备平和暴动。后我又赶回永定去。

一九二七年武汉“七·一五”事变前，中央认为“四·一二”事变后福建党组织会受到破坏，派陈明和陈昭礼来福建恢复党的组织。到福州找不到联系，以后经厦门在漳州找到了闽南特委。他看到我们还保存着的特委领导机构，很高兴。这时我正在永定下洋公学与永定的陈正、曾牧村、卢肇西等同志研究工作，接到邱泮林同志来信后，就赶到漳州，在南靖的一个旅社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明、陈昭礼、邱泮林，以及漳州、南靖、平和一带党的负责同志共十七、八人。会上陈明作了报告，传达武汉的形势和中央的意见；讨论了福建工作，重点讨论闽西、闽南和闽北等地开展工作的问題。会上我根据中央介绍信的意见，提出选举了陈明为书记，陈昭礼为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在会议期间，从报纸上获悉了南昌起义部队正向赣南进军的消息。特委决定我赶到上杭，去迎接南昌起义军。我由漳州经龙岩到上杭，经与党组织联系后，发现兰玉田部队已退出上杭城，向武平出走，估计起义军将由汀州来上杭。果真不久，周恩来同志率领一个团先来到上杭城，住在伪县党部机关（现在的实验小学）。当天晚饭后，我和上杭党组织干部蓝为仁数人去见周恩来同志。他住在第一排楼房的二楼。在二楼中间会客室接见我们，表示很高兴。当时，他任前委书记，向我们讲南昌起义的经过和伟大意义。还说要打到潮汕和海陆丰农民斗争汇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周